

郭延礼／著

文学

与中国

西学

近代

①主 编／张岱年

②副主编／邓先东

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岳麓书社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西学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的专著。近代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在此大变局中,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嬗变与转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西学对中国文学的强烈冲击与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转化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推动着中国文学由古典文学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本书首先梳理了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渠道及其所引起之反应,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创作主体、文学观念、艺术形式、思想意蕴、文学语言、传播媒介、受众群体诸方面深入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学在西学影响下的全方位变革。全书以详实的史料描述出了近代西学与中国近代文学发生关联的历史面貌,更以精当的理论分析论述了这种关联的内在逻辑。

总 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 ,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并起 ,百家争鸣 ,是为诸子时代。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于是经学成为官学 ,是为经学时代。魏晋之世 ,玄谈盛行 ,以《老》、《庄》、《易》为三玄 ,是为玄学时代。之后 ,佛教逐渐发展起来 ,至隋唐之时 ,佛学有高度发展 ,而儒门淡泊 ,是为佛学时代。北宋时期 ,理学兴起 ,批判了佛学与道家 ,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理论思维有进一步的发展 ,经历元明 ,是为理学时代。到明清之际 ,许多学者批评理学的空疏 ,趋向于考证之学 ,是谓朴学时代。十九世纪后期以来 ,西力东侵 ,西学东渐 ,到二十世纪 ,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想 ,是为西学东渐的时代。

中华学术 ,根据传统的说法 ,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是哲学 ,考据之学即是史学 ,词章之学即是文学。这是举其大要而言 ,还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天文历算、兵法、地理、医药、农学等等。但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与词章之学占主要地位。词章之学即文学 ,包含诗、赋、词、曲 ,与一般民众关系较为密切。各门学术是互相影响的。词章之学

亦受到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影响。研究历代文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关系 ,是有重要意义的。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主要研究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及近代西学东渐对于各时代的文学思潮、文学风格和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阐释各时代文学的特色及其发展过程 ,这是有重要意义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希望我为丛书写一总序 ,于是略述中华学术的源流作为弁言。

一九九七年八月 于北京大学

第一章 西学的传播

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吸收外来文化有很大关系,诚如 T. S. 艾略特所说:“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①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影响很大,但同样,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从大的方面说,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的西传,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者引发了源于十七世纪的法国而风靡于十八世纪全欧洲的所谓的“洛可可(Rococo)运动”,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绘画、戏剧对欧洲的文化时尚、园林风格、工艺制

^① [英] T. S. 艾略特《诗歌的社会功能》,转引自刘保端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第 193 页,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造和艺术创作均产生过很大影响 ;后者则是中国哲学影响了欧洲著名的启蒙运动 ,并为其理性精神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这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孟德斯鸠(C. L. des. Montesquieu ,1689—1755)与德国的启蒙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等人的思想影响上。其他如中国的孔子、孟子和老子对俄国列夫·托尔斯泰(Л. Н. о лтой ,1828—1910)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剧对德国歌德(J. W. Goethe ,1749—1832)和席勒(J. C. F. Schiller ,1759—1805)的影响 ,也都是人所共知的、有代表性的范例。但近代以降 ,中国文学(还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为显著 ,甚至可以这样说 ,没有西学东渐 ,没有中西文化交流 ,就没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和文学的辉煌。

文学的变革是需要外力的。捷克著名的文学史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 Prusek ,1906—1980)说过 :“ 如果没有外界的冲击力 ,在单一的文化条件下 ,文学的自然进化不能产生全新的结构。”^① 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 ,文学自然也要变革 ,但在中国文学转型期的近代 ,传统文学难以提供变革所需的资源和理论根据 ,因而从域外寻找这种文学变革的借鉴或驱动力 ,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近代社会既已被殖民主义的大炮打开 ,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已日趋解体 ,传统文化也不可能不受到世界潮流的冲击 ,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析的 :“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

^① 李燕乔等译《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 29 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这里的“文学”,原文是 Literature,是用其广义,它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著作,实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文化”。当中国也被卷入世界市场后,其传统文化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因此西学东渐便成为自然的趋势。

近代中国所谓“西学”,即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化,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美文化。它的基本精神就是科学和民主。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塞恩斯”(Science)与“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两大异彩的文化。

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其影响下,后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文学观念、思想意蕴、艺术形式、文学语言到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而近代报刊的出现、稿酬制度的确立,又促使了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的产生,使近代文学具有了商品属性,从而刺激了近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家群体的职业化与传媒和受众的平民化(大众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究其动因,自然也是西方文化及其文化思潮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阐释西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我们必须先从西学的传播谈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一 从明末清初讲起

“西学”这个词并不始于近代,明末就已经有了。十七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编写了一部西方大学教科书纲要《西学凡》,后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 1566—1640)又编了《西学修身》、《西学持家》、《西学治平》等书,因此“西学”便成为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的代名词。在明末清初,西学的主要内容是指自然科学。

所谓“明末清初”,主要指公元十六世纪后期、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前期前后约两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西方文化的第一次东渐,这段时间在西学传播史上又有两个高峰期:一是明末崇祯年间,二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是中西文化交流成绩最突出的两个阶段。明末自然灾害严重,民不聊生,因此引起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在边疆又先后有蒙古族和满族的骚扰、进攻,国家处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困扰之下,因此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潮。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看到西方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与国计民生、巩固边防有关:如《泰西水法》(熊三拔、徐光启合译, 1612)与农业有关,《火攻挈要》(汤若望、焦勛合译, 1643)有助于军事等,于是一些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王徵(1571—1644)等人,就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并向他们学习西学,之后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不少西书。康熙朝也是西学传播兴盛的时期。康熙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处于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国力强盛,颇有自信心,因此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活动持欢迎的态度。他信任不少西洋人,如主持钦天监工作的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比利

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就是突出的代表。

明末清初这一时期 ,在译介西学方面成绩很大 ,参加这一工作的传教士大约有七十余人 ,他们与中国的士人和学者合作 ,翻译西书计四百三十七种 ,其中纯宗教书籍二百五十一種 ,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 ;属自然科学的书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生物、医学等)一百三十一種 ,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 ;属人文科学者(包括地理、哲学、语言文字、教育等)五十五種 ,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① 后两类(占翻译西书总数百分之四十三)对于传播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这次翻译西书 ,在方式上主要是西译中述。所谓“西译中述” ,就是由传教士口译成汉语 ,再由中国学者写成中文(有的再润色)。在传教士方面著名的有利玛窦(P. Matteo Ricci ,1552—1610 意大利人)、艾儒略、汤若望、罗雅谷(Jacobus Rho ,1593—1638 意大利人)、南怀仁、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 法国人)、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 ,1575—1620 意大利人)、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 ,1571—1618 西班牙人)。中国学者方面则有徐光启、李之藻、王徵、杨廷筠(1557—1627)、李天经(1579—1659)、叶向高(1559—1627)等 ,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双方合作翻译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所译著作大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译自西书原著 ,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 ,就是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注的欧几里德(Euclid)的《原本》译出 ;二是编译 ,如邓玉函(J. Terrenz ,1576—1630 瑞士人)、王徵编译的《远西奇器图说》 ,该书是根据四种西方著作选译编辑的 ;三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长期合作研讨的成果 ,如一百三十五卷的《崇祯历书》(一名《西洋

① 参见钱存训《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载《文献》1986 年第 2 期。

新法历书》,1631—1634)就是这样完成的,主其事者为徐光启,参加者有传教士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1559—1654,意大利人)、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中国人有李之藻、李天经等。再如《数理精蕴》是中国数学家梅籬成(1681—1764)等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编成的一部集西方数学之大成的五十三卷的巨著,历时三十一年(1690—1721)始成。此外,他们还合作翻译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物理、制造、医学、地图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书籍,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测量法义》(1617)、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1612)、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1614)、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1626)、艾儒略与杨廷筠合译的《职方外纪》(1623)、邓玉函与毕拱辰合译的《泰西人身说概》(1635)。此外这时期还翻译了一些有关论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和艺术类的书籍,如葡萄牙传教士傅汎际(Franciscus Furtado,1587—1653)与李之藻合译的诠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el's,前384—前1322)逻辑学的《名理探》(1631)、南怀仁译的《穷理学》(1683)、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 Pereira,1645—1708)用中文著的音乐类书籍《律吕纂要》(1713)、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和王徵合译的语言学著作《西儒耳目资》^①(1626),以及金尼阁与张賡(泉州人)合译的伊索寓言选本《况义》(1625)等。所有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视野。

明末清初的西书翻译是很有成绩的,它不仅使中国人民了

^① 罗常培认为此书是“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音韵学上的第一个贡献”,又说:明季耶稣会士“给音韵学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蹊径”,他们“要算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臣了”。详见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本第3分册第289、267页。

解到西方的科学和文化,而且对中国的士大夫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徐光启、李之藻就是受这种影响的代表人物,而且它还改变了中国的学术风尚,促进了求实学风的形成。后来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对历算、西北史地的兴趣,乃至乾嘉汉学的科学精神和实证学风,显然都受到明末清初这次西学东渐的影响。^①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次西学东渐因清廷对天主教的严禁和罗马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而中止。在中国历史上,这次前后持续了二百四十年的西学传播虽有种种局限,诸如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并不是近代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其中还杂有中世纪神学色彩,传教士既以传教为最终目的,当然传播科学知识也只是传教的一种手段,但这次西学东渐的历史贡献还是应充分肯定的。

二 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迫切需要一批翻译人才。另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1858年签订、1860年批准的《中英天津续约》(即《中英天津条约》)规定“(1)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2)在中国未有翻译人才前“暂时仍以汉文配送”(3)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②。因此培养翻译人才成了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各

① 张维华云:“乾嘉诸儒,无不通习西法,不独东原为然。西法影响中国之深,于此最显。说者或谓清初汉学之风,实具有科学精神,而此种精神之发生,西学实开其先。此论虽近武断,然汉学之发展,亦受助于西学,如上述西法之影响,则乃近于事实。”参见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第196页,齐鲁书社1987年版。

② 丁韪良原著、傅任敢辑译《同文馆记》,见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4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奏请皇上开设同文馆：“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皆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① 奏准，同文馆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北京总理衙门内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继明代成立的四译馆（原名四夷馆）之后又一个专门的外国语学校。

京师同文馆开办时只有英文馆，开始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 1826—1907）充任英文教习（因他通汉语），中国人徐树琳充任汉文教习。^② 同文馆开始规定学员从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资质聪慧者”中挑选，目的是培养八旗子弟担任外交事务，避免汉人参与。开始时学生只有十人，后为汉族中的士大夫所反对，又改为招收十五岁至二十岁的满、汉子弟。1863年又增设法文馆，并将理藩院中的俄罗斯文馆并入。1866年同文馆决定再增设天文、算学二馆，学员年龄条件也放宽了。这样同文馆除学习外语外，还要学习西学。1872年同文馆又增设德文馆，1896年又增设东文（日文）馆。至七十年代，同文馆不仅成为我国第一所具有英、法、德、俄四个语种的外国语学校，而且也是一所培养西学人才的学校。

同文馆始创的几年，一度缺乏外文教师，有的教师教学也不甚得法，不少学生中途辍学。到1869年，英文馆只剩下两名学生，法文馆八名。俄文馆由于是从理藩院原俄罗斯文馆并入，基础较好，故学生最多，有十八名。七十年代后，同文馆开始走向

① 恭亲王等《奏设同文馆折》，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② 包尔腾充任教习，系由英国威妥玛（Wade Thomas）介绍。其待遇甚丰，第一年年薪银三百两，第二年增为一千两，而中国教习徐树琳仅为月薪八两。

正规,规模也逐渐扩大。^① 经总税务司赫德(R. Hart, 1835—1911)介绍,由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接任总教习,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此时也进馆任算学教习。在同文馆任教的多数是外国人,主课由他们主讲:化学由法国人毕利干(M. A. Billeguin)担任,他用中文写了一本化学教材;医学、生理学由英国人德贞博士(Dr. Dudgeon, 1837—1901)担任;天文学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海灵敦(M. Harrington)担任;格致(即物理学)由爱尔兰人欧礼裴(C. H. Oliver, 1857—?)担任,又有上海、广州两地方言馆选送的优秀生员。在此基础上,丁韪良(他在同文馆任职三十二年,即1863—1894)采取了整顿与强化措施,同文馆气象由此大为改观。下面是1879年同文馆所公布的课程表: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②

^① 同文馆的学生人数,开始只有十人(英文馆),添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后,每馆也只有学生十人,后来逐渐增多,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同文馆的学生增加到一百二十人,直到同文馆1900年完全停办,均为这个规模。见《京师同文馆略史》,载北京图书馆《读书月刊》第2卷第4号。

^② 见《京师同文馆略史》。

从这个课程表可以看出,同文馆的教学是相当正规和有系统的。在这八年中,学生除学习外语外,还要学习自然科学、史地和法学之类的功课,而且全部学习(特别是后四年)始终以翻译为重点。

以翻译为重点,固然是为了当时提供教材和宣传西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教学的角度讲,它有利于促进外文学习。翻译乃是外语教学的实践课,同文馆的学生在外国教习的指导下翻译西书,对提高外语水平和学习西方自然科学都有好处。不少学生,由开始与外国教师合译逐渐发展为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译书。如高才生汪凤藻(1851—1918,江苏元和人)就译了《英文举隅》、《公法便览》(与汪凤仪合译)、《富国策》、《新加坡律例》,联芳、庆常译了《星轺指掌》、《公法会通》,杨枢、长秀译了《各国史略》等。这种优异成绩的取得,与同文馆始终注意翻译实践的教学内容有关。这点即使在今天,对于外语院系的教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就是教师在翻译中的指导作用。不仅译本原著的选择是由同文馆的教师(主要是外籍教师)确定的,而且在翻译中教师的具体指导(如译文如何表述)肯定也会很多。比如席淦、贵荣等人译的《格物测算》,注明“丁韪良口授”。所谓“口授”除一般“口译”外,我以为还带有翻译中的具体指导。再如上面提到的汪凤藻、联芳和庆常译的几种书均注明“丁韪良鉴定”,席淦、贵荣编译的《算学课艺》注明“李善兰鉴定”,还有的译书注明“骆三畏鉴定”、“欧礼裴鉴定”。这里所谓“鉴定”,大约即今天的审定、校定的意思。在评价同文馆学生译书成绩时,应充分考虑到教师的指导作用。

同文馆的学制有八年和五年两种^①,后者除不学外文外,其他课程与八年制差不多。又规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分月课、季考、岁试和三年一次的大考四种。从曾担任过同文馆监考官的翁同龢的记载看^②,考试还是比较严格的。而且,月课、季考、岁试都有现金奖励,每年用于奖励优秀学生的现金有一千^③。三年的一次大考,对优秀者授以功名。这种严格的考试、奖励制度对于同文馆教学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文馆至 1902 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前后历时四十年,其间培养了不少外交、科技和翻译人才。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成绩尤为可观。近代许多驻外使馆人员大都是同文馆的学生,有的是一般随行人员和翻译,有的则担任过驻外国领事馆的公使、大臣和外交官。其中佼佼者有曾任驻荷兰、意大利公使的唐在复,任出使法国大臣的刘式训,任出使比利时大臣的杨兆璜,任俄国公使的刘镜人,任出使日本大臣的杨枢,而陆徵祥不仅做过数国驻外公使、大臣,还担任过民国时期的外交总长。

同文馆的另一贡献是翻译了二十六种西书^④,比较重要的

① “其年龄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藉译书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见《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四年(1899)刊印本。

② 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第1981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③ 丁韪良原著、傅任敢辑译《同文馆记》,见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30页。一千元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④ 丁韪良《同文馆记》一文中关于《同文馆师生译书籍表》所记为二十二种,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所列书目为二十六种。

有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汪凤藻^①译的《富国策》、德贞译的《全体通考》、俄文馆学生译的《俄国史略》等。这之中影响比较大的自然要推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此书是同文馆的早期译著,1864年出版,原名为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直译应为《国际法要旨》,是美国著名法律学家惠顿(H. Wheaton, 1785—1848)的力作,在欧美也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著作。1864年经丁韪良译出后,不仅被长期用作同文馆的教科书,而且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成为办理外交和对外商务中的重要参考书。清政府总理衙门曾刊印三百部送给有关方面和每一个通商口岸,成为那里的地方官员和办理外务人员的法律参考书。再如,汪凤藻译的《富国策》(英国法思得著),是一本商业概论之类的书,在当时颇受好评。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说《富国策》“精义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盖非专门名家者,不能通其妙奥也。中国欲振兴商务,非有商学会聚众讲求、大明此等理法不可”^②。其他如法律学译著《公法便览》(汪凤藻、汪凤仪译,六卷,1877)、《公法会通》(丁韪良、联芳、庆常合译,十卷,1880)、世界史译著《各国史略》(杨枢、长秀译)、《俄国史略》(俄文馆学生译)、自然科学类译著《化学阐原》(毕利干与学生承霖、王钟祥合译)、《格物测算》(席淦、贵荣译)、《分化津梁》(施德明、王钟祥译)等,这些译著出现在十九世

① 汪凤藻(1851—1918),字芝房,江苏元和(今江苏苏州)人,系上海广方言馆首届学生,毕业后被选送至京师同文馆深造,1891年至1894年任出使日本大臣,曾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

②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第9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时务报馆石印线装本。

纪的六十至八十年代 ,对于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法律、史地知识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虽然其中有些译著“译笔亦劣” ,甚或“诘屈聱牙” ,但对这些译著在宣传西学方面的作用还是应予以肯定的。

其次 ,同文馆的译书也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教材急需 ,如法国教师毕利干译的《化学指南》、英国教师欧礼裴编译的《弧三角阐微》、丁韪良著译的《格物入门》 ,以及上面提到的《各国史略》等 ,都曾被用作同文馆学生的教科书。

京师同文馆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 ,也是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雏型 ,它的存在不仅在西学宣传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而且对这之后的新式学堂也具有一种示范作用。

三 上海广方言馆

早在京师同文馆创始之前的 1861 年 ,中国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冯桂芬就曾在他的《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提出在广东、上海设立外语学校的建议 ,他说 :

今欲采西学 ,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 ,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 ,倍其廪饩 ,住院肄业 ,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 ,兼习算学。^①

冯氏这一建议不仅为日后在上海、广东创立广方言馆预设了总

^① 《校邠庐抗议》第 210 页《醒狮丛书》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